

158期

中華民國一五五年六月
第一五八期

June 2026 NO.158

國內郵資已付
中華郵政北台
字第 7502 號
執照登記為
雜誌交寄

(限向郵局窗口交寄)

雜誌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目錄

專論

- 1 中國大陸人口結構問題觀察
■王占璽
- 5 中共權力繼承的政治議程：
21大與習近平接班人安排（將提早或延後？）
■陳世民
- 9 共軍對臺「聯合戰備警巡」之分析
■莊念鋼
- 13 從「武力解放」到「威懾統一」：
中共對臺軍事政策的演變
■彭冠達

專刊動態

- 15 《政治科學論叢》「歷史與國關」專論
■吳玉山

會議紀實

- 18 2026年TASPAA年會中的中國大陸研究
■陳聿伶

臺大政治學系 發行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贊助

中國大陸人口結構問題觀察

王占璽 / 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

- 2025年中國大陸新生兒數量下降至792萬人，下降幅度超過預期，反映中國大陸少子化問題仍在加速，可能將在3至5年內趕上臺、日、韓。
- 當前中國大陸人口結構在年齡、城鄉與性別上均存在失衡，對於產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系統的衝擊將持續擴大，而超過預期的快速變遷將壓縮政府與社會的準備及適應時間。
- 中國大陸近年積極為人口結構轉型尋找對策，除在鼓勵婚育與老年照護領域提出多項政策外，也透過「十五五」規劃調整產業結構與發展動能，但相關政策成效有限。

一、前言：從成長導向轉向生產力重構

中共民政部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大陸全年出生人口僅為792萬人，全國總人口降至14億489萬人，連續四年呈現負成長。近年來人口變遷的趨勢顯示新生兒下降速度加快且超過各界預期，而退休老年人口的擴張速度也已進入高原期。人口結構快速而劇烈的變遷，已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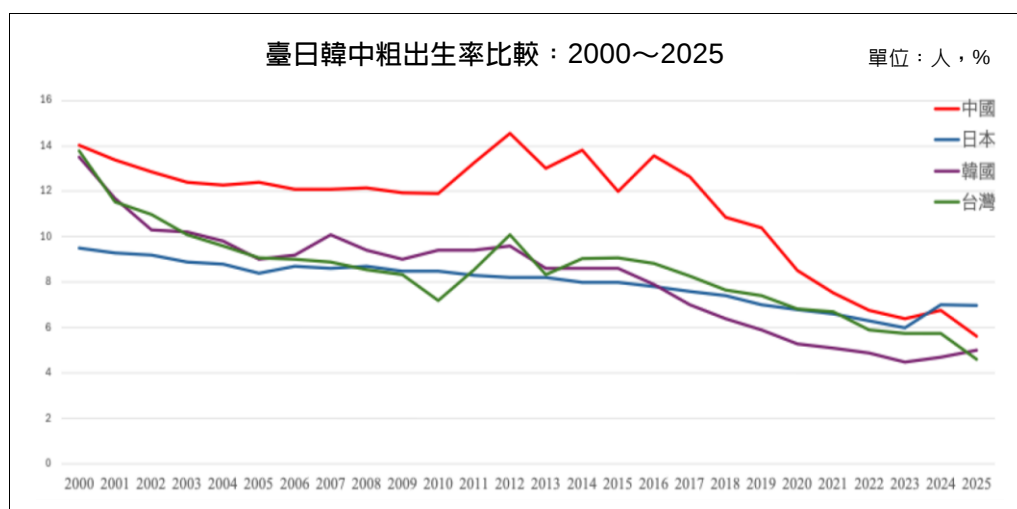
對中國大陸社會產生具體衝擊，且影響層面及程度將在未來持續擴大。

二、中國大陸人口結構的變遷趨勢

(一) 出生人口雪崩式下跌，下降速度超過臺日韓

自2016年以來，中國大陸出生人口快速下降，2025年新生兒792萬僅為2016年的44%，不但同時跌破900萬與800萬兩個預期門檻，也創下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的最低紀錄。

近年來中國大陸新生兒呈現雪崩式下滑，下降速度更高於東亞地區同樣面對嚴重少子化問題的臺灣、日本、韓國。從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 CBR；指一年內每千名年中人口的新生兒數量）來看，中國大陸在2001~2016年間仍然遠高於其他三國，卻在近10年間迅速下降，至2025年粗出生率5.63‰已經低於日本。若維持此一速度，中國大陸可能在3年至5年內趕上臺、韓，擠身少子化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列。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及內政部資料，作者製圖

由於青年婦女群體的人口規模持續縮小，中國大陸未來的人口出生率仍面臨顯著的結構性壓力。2016 年 20 至 34 歲女性約為 1.6 億人，2025 年降至 1.3 億人，2035 年再降至 1.1 億人，亦即每年平均減少約 200 萬人。2025 年中國大陸的總和生育率（女性一生平均生育數量）已經低於 1.0，若維持此一水平，育齡婦女人數的持續收縮，將進一步壓低未來出生人口規模。

(二) 老年人口比例及年度死亡人口創新高

在人口結構上，老齡化與少子化幾乎是同時出現的現象。在 2021 年中國大陸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中，65 歲以上人口佔比 13.5%，60～64 歲則為 5.2%。2025 年則上升至 65 歲以上人口佔比 15.9%、60～64 歲人口佔比 7.1%，呈現明顯的高速老齡化趨勢。

同樣放在東亞國家的比較脈絡下，從老齡化社會（65 歲以上人口超過 14%）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65 歲以上人口超過 20%）的時間，日本經歷了 11 年，臺灣與韓國均耗時約 7 年（臺灣為 2018 年至 2025 年，韓國為 2017 年至 2024 年），中國大陸則可能也僅需使用 7 年時間（2021 年至 2028 年）。這是因為中國大陸曾在 1963 年後出現一波延續 10 年的嬰兒潮、每年出生人口均達 2,500 萬人以上，當前此一世代已經陸續進入退休年齡，在未來 10 年估計每年將新增 2,000 萬以上老年人口，並使老年人口比例年均提升 1.7% 以上，從而將使中國大陸可能在 2028 年超過 20%，並在 2032 年超過 30%。

另一方面，2025 年中國大陸人均預期壽命為 79.52 歲，「十五五」規劃期間預計提升至 80 歲。2023 年 80 歲以上人口已經接近 4,000 萬，在總人口佔比 2.8%；未來預計在 2030 年達到 5,300 萬，佔比升至 3.8%。與此一趨勢應對的是逐年提高的死亡人口，2021 年的死亡人數已經達到 1,040 萬，2025 年增加至 1,131 萬人，

達到 1968 年文革高峰以後的新高點。同時，死亡率預計將持續攀升至 2060 年。死亡人口成長加上出生人口下降，也導致中國大陸人口負增長速度加快。

(三) 撫養比升高，城鄉與性別失衡

在人口結構上，少子高齡化直接導致勞動人口（15 至 64 歲）的比例降低，以及撫養比的提高。中國大陸勞動人口比例在 2010 年達到 74.5% 的高峰後開始滑落，2022 年下降至 68.2%，2025 年則為 68.9%，2025 年比例微幅回升的主因是近 4 年來人口負增長，以及 2010 年以前的出生人口高峰逐漸進入勞動市場。

在 2023 年勞動人口平均年齡已經達到 39.66 歲，意味多數勞工群體需要同時撫養家庭中的老人與兒童。在少子化的影響下，勞動人口群體的撫養負擔偏向老年人口，2025 年達到 23%，平均每 4.33 名勞工撫養一名老人。而納入 0 至 14 歲人口後，整體撫養比達到 45%，對中年勞工形成龐大經濟壓力。

人口結構也存在城鄉與性別的嚴重失衡。目前中國大陸居民城鎮化比例仍在持續提高，2025 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67.89%，人口數 9 億 5,380 萬人，比 2024 年提高 1,030 萬人。而勞動年齡人口分佈存在農村高於城鎮、男性高於女性的失衡現象。2023 年城鎮勞工的平均年齡為男性 40.26 歲、女性 38.07 歲，農村勞動人口平均年齡則為男性 41.60 歲、女性 39.06 歲。

進一步看，人口性別的城鄉分佈存在「農村剩男、城市剩女」的雙向失衡現象。2021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城市青少年的性別比為 106（每 100 名女性對應 106 名男性），農村則高達 120。另據非正式統計，中國大陸農村未婚男性青年將近 3,000 萬人，而一二線城市的未婚女性青年則可能有 2,000 萬人以上，此種失衡分佈也擴大中國婚育程度偏低的問題。

三、人口結構迅速變遷，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複雜衝擊

生育率持續下降與高速的老齡化，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大陸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興社會問題，中長期更將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障礙。而少子化惡化速度超過預期，更嚴重壓縮政府、社會與企業進行預先準備與調適的空間，對於經濟社會結構的破壞力恐怕遠超過預期。

隨著新生兒的減少，婦產科診所、幼兒園與嬰兒用品產業已經面臨坍方式的經營危機。2024 年有 2 萬家幼兒園倒閉，並導致超過 24 萬名幼兒教師失業；小學在 2023 年後開始面臨每年減少超過 200 萬生源的困境，初中、高中則分別預估在 2026 年、2029 年之後生源下滑。目前，中國大陸多所師範大學已經不再培養學前教育專業的本科學歷學生，以適應教師市場的快速萎縮。此外，各省市中小學也開始出現教師編制快速緊縮、要求現職教師轉換崗位的趨勢，使失業問題因少子化而加劇。2030 年開始，少子化浪潮更將無可避免地擴散至勞動市場，造成勞動力與消費力的持續短缺，進而限制市場需求以及整體經濟發展的動能。

而在老齡化問題上，「未富先老」與消費力疲弱則將造成另一種面貌的經濟社會衝擊。中國大陸老齡化程度即將趕上其他東亞國家，但社會整體財富卻相對不足。同時，老年人口的財富分配嚴重不均，在目前超過 3.2 億的退休人口中，領取每月養老金低於 200 元人民幣的農民高達 1.8 億，而月領超過 5,000 元以上的城鎮退休人員僅約 1,700 萬，佔退休人口總數的 5.3%。就此，多數退休人口仍須仰賴子女扶養，從而加劇勞動人口的負擔。而中共提倡的「銀髮經濟」也缺乏現實經濟基礎作為支撐。

少子化與高齡化問題的疊加將產生更為複雜的社會變遷效應，並且易於與既有社會政策的內在矛盾共振。例如在社會保障服務上，退休人口的逐年增加已經提高了現行養老與醫療

保障系統的負擔，2019 年中國大陸社科院曾估計養老保險基金將在 2035 年間破產，但此一估計顯然未曾考量近 10 年來少子化趨勢的衝擊。少子化浪潮將在 2030 年後開始導致勞動人口的持續縮減，並且加速社保繳納人數的下滑與養老保險的崩潰。

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區域及城鄉差距的擴大。在省級範圍內老齡化與少子化趨勢會相互強化，目前已經進入中度老齡化的 21 個省市中，有 16 省市的出生率低於全國平均。相對應的是出生人口集中在少數省份，如 2024 年廣東、河南、四川、山東四省新生兒共計 307.6 萬，佔當年全國出生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東北、西北各省則大多同時面對老年人口增加與新生兒降低的衝擊。進一步納入死亡與外移因素來觀察各省人口變遷趨勢，則 2025 年只有廣東與浙江仍有明顯的人口增長，其餘省份均面對人口規模縮減的衝擊。

而在城鄉差距上，農村青年人口向城鎮外移的趨勢，與農村老年化及空洞化的現象互相強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指出，2020 年全國農村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總人口 23.8%，同年城鎮老年人口僅有 15.8%，兩者相差 8%。及至 2023 年，農村老年化程度升高至 26.5%，城鄉老年化差距則擴大至 8.7%。另根據 2024 年中國大陸鄉村振興綜合調查數據，全國農村人口淨流出的「空心村」比例已經高達 91%。農村人口的快速老齡化不但意味著社會撫養成本的增加，也對傳統的「三農」問題形成新的挑戰。

四、中共對策與挑戰

面對人口結構的劇烈變化，近年來中共持續採取多管齊下措施以緩解衝擊。在甫於 2026 年 3 月人大會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綱要中，便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人口發展戰略。但在近年實際運作中，這些政策的具體成效卻不明顯。

對於少子化問題，中共除了在 2020 年以前逐步放寬計畫生育政策的生育限制外，近年也積極提出各類鼓勵婚育政策。如在 2025 年起針對撫養 3 歲以下幼兒的家庭提供每月 3,000 元育兒津貼，以及取消在戶籍制下行之有年的婚姻登記制度。此外，許多地方政府也針對初婚夫妻提供額外補助。然而，此些政策往往被中國大陸民眾譏諷為杯水車薪，不足以有效緩解婚育意願下降的趨勢。

以直接影響生育意願的結婚對數來看，2025 年的全國結婚登記 676.3 萬對，比 2024 年增加 65.7 萬對，成長 10.76%。中共官方稱此一回升趨勢反映鼓勵婚育政策的成效。事實上，此一微幅成長的前提是 2024 年的結婚對數是 1980 年以來最低的 610 萬人，而 2025 年結婚對數是近 45 年來第二低，且僅約為 2013 年的一半，說明青年群體的結婚意願仍然相當低落。

此外，2026 年 2 月上旬網信辦展開「清朗·2026 年營造喜慶祥和春節網絡環境」專項行動，聚焦惡意挑動負面情緒等內容進行打擊，並將宣揚不婚不育、反婚反育、性別對立等資訊視為違規內容。此舉說明在持續惡化的少子化壓力下，青年婚育已經上升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內容，也反映當前鼓勵婚育政策缺乏成效，需要動用意識型態工具進行治理。

而對於老齡化問題，中共更提出一系列對策，包括規劃養老服務設施佈局、鼓勵銀髮經濟發展、延長法定退休年齡、持續提高以農民為主要對象的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額度等。然而，老年人口群體在經濟、醫療、照護、居住上的需求更為複雜，且大多深刻連結中國大陸既有的制度不平等問題，因而更難提供完善的解決方案。

單以退休農民養老金為例，近年來一直是「兩會」期間人大、政協代表集中討論的熱門議題，2026 年有多位「兩會」代表提出應大幅提高農民養老金的建議案。同時，現行社保制

度下養老保險的破產風險也持續引發關注。但是對於此些問題，中共當局一直缺乏決心通過加大財政挹注或推動制度改革來解決問題，也因此提高社會的不滿。

除了直接針對婚育與養老需求制訂政策外，中共在「十五五」規劃綱要及 2026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設定科技自主創新、新質生產力、「投資於人」的發展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因應人口結構的迅速變遷，希望為中國大陸社會進入人口負債階段進行經濟發展轉型的準備。然而，此些重大發展戰略的調整也衍生出新的社會成本。如近年強調「人工智能+」的產業政策，有助於降低重要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卻也可能使目前嚴峻的青年失業問題更加惡化。而失業擴大又將影響民眾的生育意願及照護老人的能力。

五、結語

中國大陸人口結構正在快速轉向少子老齡化社會，過去 30 年來作為經濟快速成長基礎的人口紅利已經轉變為人口負債，也促使中共當局必需積極建立新發展動能。然而，不論是回應人口結構變遷帶來的實際社會需求，或是尋求新的發展模式，都需要中共當局展現完整的政策規劃及靈活的治理能力。在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疲軟、財政能力下降的形勢下，中共當局對於當前人口問題及其衍生的社會問題是否能做出積極有效的因應，將對未來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消長與社會穩定程度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中共權力繼承的政治議程

21大與習近平接班人安排（將提早或延後？）

陳世民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中共權力繼承的政治議程有如宮廷政治一般，外界難以了解內部實情，也因此傳聞眾多、眾說紛紜。茲就個人的一些觀察研析如下。

一、張又俠事件： 更爲集權或權力鬥爭跡象？

2026年1月24日傳出官方正式宣佈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及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因「嚴重違反紀律和法律」遭立案審查。官方社論將兩人行爲定性爲「嚴重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這暗示其權力已大到足以挑戰習近平的權威。張又俠被視爲習近平最信任的軍中盟友及「紅二代」世交，張又俠在軍中根基深厚，其長期建立的人脈網被視爲習近平權力結構中的「不安全因素」。張又俠的倒臺象徵著中共軍中傳統「紅二代」世交關係的保護傘徹底消失，權力忠誠度成爲唯一準則。對張又俠開鋤被視爲習近平政權進入「斯大林晚期」的跡象，即不再信任任何人，包括自己人，以確保絕對權威。從事後習近平陸續接見芬蘭總理及英國首相，至少目前看來習近平更爲集權，短期內更加看不到任何可以挑戰習近平權力的人。

張又俠的下臺，也可能與中國內部出現權力鬥爭有關，可能不僅是單純的經濟反腐，更涉及深層的政治衝突。這次的整肅規模罕見，張又俠曾被視爲習近平最親密的軍中盟友。此次調查不僅針對他，還包括中央軍委委員、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目前中央軍委7人名單中，僅剩習近平與張升民兩人未受波及，其

領導層的不穩定程度被形容爲「文化大革命」以來之最。習近平是否遭遇其他派系的權力挑戰，目前雖然仍不明瞭，但值得繼續觀察。

二、走向史達林模式？： 掌權到死爲止、避免安排接班人

張又俠的下臺可能象徵習近平走向史達林及布里茲涅夫的掌權模式，避免安排接班人，並掌權到死爲止。也難再信任任何人，包括自己人，因而不斷清洗，以確保絕對權威。而二人死後蘇聯均經歷數年的政治鬥爭、領導人更替的混亂局面。

史達林的掌權模式是一種極度集權、結合官僚控制與特務恐怖的統治藝術，將原本列寧時代的「集體領導」轉化爲高度神格化的「個人獨裁」。結合了官僚操縱、政治鬥爭、特務恐怖與個人崇拜，而形成的高度集權體制。以行政任命建立基礎，以政治博弈清除高層，以特務恐怖壓制中層，以思想洗腦控制底層的統治模式。目前習近平也是將中共從鄧小平時期的「集體領導」轉型爲一種個人獨裁模式。

就像史達林及布里茲涅夫那樣，習近平不太可能很早就指定接班人，習近平的繼任者也很難有序上臺，或可以輕易預測。這種不透明性令人擔憂，習近平的繼任者是中國政治中最大的「已知未知數」。我們不知道習近平何時卸任，也不知道他將如何卸任，更不知道他是否會指定政治接班人。如果習近平不指定接班人，我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選出繼任者。

如果習近平能夠扶植一位強有力的接班人，既能延續他的政策，又能保護他的家族，那麼習近平或許能夠避免權力鬥爭，從而防止黨內分裂、損害國家利益，損害平近的政治遺產。習近平當然希望如此，但其政治代價可能極為高昂。我們也無法窺探習近平的內心，任何現有的接班計畫都將是他嚴守的政治秘密之一。

習近平離任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包括自願離職、精英叛亂、軍事政變或突發疾病——每種情況下都可能出現巨大的變數。習近平不太可能在短期內主動指定接班人，更遑論交出權力。這樣做可能會削弱他的權威，加劇其支持者內部的分裂，最終威脅到他的政治遺產和人身安全。而目前，習近平的權力——尤其是他對人事、意識形態、安全部門和軍隊的集中控制——使得任何對手都很難組織起來反對他，即使他的政策不得人心。

(一) 自願離職並指定接班人，可能會削弱習近平的權威。

一旦習近平宣布接班人，他可能就會成為跛腳鴨，因為政治精英會開始與接班人建立微妙的關係，並更多地聽取其政治指示。即使接班人只是服從習近平的命令，黨內實際上也會出現多個權力中心。此外，接班人還會成為一個焦點，使得黨內人士在任何危機時刻更容易聯合起來反對習近平的領導。

在任內將權力移交給繼任者，也可能會威脅習近平的政治遺產。習近平退休後一定仍希望保持強大的非正式影響力，但他顯然更傾向於正式職位帶來的安全感。他的反貪運動和意識形態鎮壓為他樹敵眾多，習近平或許會擔心自己的自由和安全，或至少擔心其政策重點能否長久推行。卸任也可能使習近平容易受到繼任者隱藏的偏好和政治才能的影響（在習近平成為領導人並開始展現其個人野心和政治手腕之前，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本性）。

(二) 選擇接班人也可能削弱習近平的政治支持。

習近平很可能會選擇一位親信政治盟友來推進他的政治計劃。但這樣的選擇意味著放棄其他選擇，這可能會疏遠那些被排除接班的高級官員。這也可能賦予與指定接班人關係密切的低級官員權力，同時削弱那些沒有這種關係的官員的權力。這種分裂可能會削弱習近平動員黨內精英執行其決策的能力。如果習近平試圖透過提名非習派人士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所有的親信都可能會感到自身地位岌岌可危，他們可能會聯合起來破壞接班人，進而破壞習近平本人。

上述種種問題可能使習近平短期內不願任命繼任者，即便這會損害他長遠的政治遺產。因此，習近平繼任者最有可能的先例是從毛澤東到華國鋒的交接。1971年林彪過世後，毛澤東曾考慮王洪文作為接班人，但後來改變主意，最終在1976年9月去世前五個月選定華國鋒。華國鋒此前默默無聞，但擔任最高領導人不到兩年就被鄧小平取代。這段歷史揭示了繼任預測中另一個令人困惑的因素：在決定是否任命接班人以及接班人人選問題上，習近平可能會改變主意，甚至多次改變主意，就像史達林及布里茲涅夫那樣。

隨著習近平年齡增長，他可能會越來越多地培養政治接班人，並且很可能需要將更多職責委託給下屬。但是，習近平退休的任何跡象都會對精英政治造成巨大衝擊，盟友和對手的反應都會影響他的想法。如果他感到不安或受到威脅，他可能會取消計劃。同樣，即使確定了接班人，如果習近平開始懷疑其忠誠度或能力，這項任命可能不會持續。

(三) 習近平的繼任者也很難有序上臺，或可以輕易預測

無論習近平的繼任者以何種方式接班，其

權力都不太可能與習近平匹敵。繼任者任命得越晚，權力可能越弱。如果習近平不指定繼任者，那麼習近平的不同追隨者群體很可能會爭奪最高權力。就像史達林及布里茲涅夫那樣，二人死後蘇聯均經歷數年的政治鬥爭、領導人更替的混亂局面。這種不確定性及混亂，源自於黨內缺乏明確的接班機制。

(四) 精英階層的反叛並非不可能

歷史上，三分之二被推翻的獨裁者是被內部挑戰者推翻的包括被政權菁英謀殺、廢黜、逼迫退位或逼迫自殺。對習近平而言，經濟衰退或軍事冒險，或者他開始清洗最親密的盟友，都可能成為引發叛亂的導火線。

(五) 如果習近平突發健康問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誰也無法預料，權力繼承鬥爭可能會十分慘烈

中共《黨章》第 23 條規定，總書記由中央全會選舉產生，且必須從政治局常委中產生。習近平的繼任者很可能（但不一定）是現任政治局常委，因為全會理論上可以增選一名政治局常委，然後任命其為總書記。但是，如果沒有總書記，中央委員會要如何召開全會呢？《黨章》規定，政治局負責召開全會，但召集政治局會議的卻是總書記。這個法律難題凸顯了非正式權力在決定北京政治走向的重要性。權力繼承鬥爭可能會十分慘烈，勝利者可能取決於脅迫，也就是說，要獲得軍隊、警察、情報部門和其他安全相關部門的支持或控制，以強制執行權力交接。

(六) 習近平可能會掌權至死方休

截至 2026 年初，習近平尚未公開指定具體的接班人，且外界普遍預期他將在 2027 年的中共「二十大」尋求第四個總書記任期。習近平已於 2026 年元旦致辭中強調，未來五年（第十五個五年規劃：2026-2030）的重點在於高質

量發展與技術自給自足，顯示其政治議程已規劃至 2030 年。最新的政情發展顯示，他正透過清洗軍方高層（如張又俠等人選的傳聞與異動），進一步鞏固對接班程序的控制權。為了避免權力過早流失或出現競爭派系，習近平至今未在政治局常委中安排明顯的「儲君」，刻意壓低接班話題。

習近平可能會掌權至死方休，這可能產生什麼影響？政治局勢將日益不穩定，因為其他領導人會為了應對突發的權力交接危機而相互博弈。決策過程可能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和不穩定。政策可能仍會強調國家安全，來轉移經濟社會問題的焦點，採取以國家干預為主的經濟解決方案，並捲入與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戰略競爭。

三、習派內部是否會出現權力鬥爭？ 張又俠事件是蔡奇主導的嗎？

當一個政權掃清了所有外部反對勢力（如江派、胡派）後，內部的「定於一尊」往往並不意味著和平，反而會進入更殘酷的「內捲式鬥爭」。從目前的局勢觀察，習近平派系（習家軍）內部的權力鬥爭不僅會出現，近期跡象顯示，習近平派系（習家軍）內部鬥爭正顯著升溫。根據 2026 年初的最新局勢觀察，這場權鬥已從「剷除異己」轉向「內部大清洗」。張又俠案標誌著習近平的清洗對象已延伸至「親信中的親信」。

隨著昔日江、胡派系勢力式微，習近平提拔的親信內部出現了分化。習近平為確保權力不失控，可能正刻意激化內部派系之間的競爭。目前觀察到習近平用人圈子收窄，當權力集中在單一派系後，內部為爭奪資源與接班身位的鬥爭反而會增加。而習近平的政治邏輯已進入類似「史達林式」的極端疑懼，透過不斷整肅來消除心中的不安感。這種「內部自我消耗」式的鬥爭雖然短期內鞏固了習近平個人權威，但也暴露出中共權力結構的脆弱，且因決

策圈過窄，可能導致未來執政出現更嚴重的誤判風險。

四、21 大的第四任期：

習近平有足夠的統治正當性嗎？

習近平在法律與權力結構上已為第四任期掃清障礙，然而，其實質統治正當性正從傳統的「經濟發展」轉向「國家安全」與「民族復興」。若經濟結構性問題無法解決，二十一大後的統治將高度依賴社會監控與外部危機的轉

移。中共統治正當性長期依賴經濟增長。然而，隨著房地產危機、人口紅利消失以及 GDP 成長面臨「保五」壓力，如果經濟持續低迷，民眾的默許支持度（社會凝聚力）將面臨考驗。此外，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生育率持續下滑，新生兒數量創歷史新低，長期的社會結構性問題正削弱其政權的長期穩定基礎。若國內經濟無法支撐統治正當性，習近平可能會藉由推動統一臺灣或在國際對抗中採取強硬姿態，利用民族主義來換取執政的合法性。



徵稿啟事

本通訊歡迎關於中國大陸研究及教學方面的稿件。包括課程設計、教學心得、研究札記、各單位的活動簡訊、新教材或研究資料的引介、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及時問題討論等與中國大陸教學研究相關的課題。文長以三千字左右為宜，不須註解，並書明投稿人姓名、工作單位、職稱、聯絡地址與電話。來稿請寄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或傳真至 02-2365-3433，或將電子檔案傳送至 politics@ntu.edu.tw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讀者來信

本欄歡迎讀者來信，就有關大陸研究與教學發表意見、評論，或分享體驗。我們希望通過本欄為這方面的交流開闢一些空間，故不考慮人身攻擊或不帶反省性質的情感發洩。來信請提供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編輯保留選稿及剪裁的權利。來信請寄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共軍對臺「聯合戰備警巡」之分析

莊念鋼 /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所碩士

本文聚焦於共軍對臺軍事行動態勢之實證分析，探討聯合戰備警巡之多層次戰略意涵。本研究之三大核心目的：一、釐清「聯合戰備警巡」的語義構造與軍事語言特徵。二、分析「聯合戰備警巡」行動模式之演變趨勢與操作特徵。三、評估「聯合戰備警巡」對臺灣及區域戰略環境之多層次影響。本文歸納出以下三項核心發現，分述如下：

一、聯合戰備警巡為制度化的灰區行動工具

本文首先嘗試釐清「聯合戰備警巡」這一概念在語義構造上的精確內涵。就字面解構而言，「聯合」意指海空聯合作戰，呈現解放軍跨軍種協同的制度化成果；「戰備」象徵隨時可投入作戰的準備狀態，在心理層面對臺灣形成持續性威懾；「警巡」則強調常態化的主權宣示與區域控制，在話語層面逐步建構對臺海的管轄正當性。三者組合，並非隨意的修辭拼接，而是具有高度政治與軍事意圖的語言設計，精準呈現中共對臺軍事施壓的核心邏輯與話語策略。

從核心本質觀察，「聯合戰備警巡」首先是一種制度化的訓練行動。透過高頻次、常態化的巡航活動，解放軍得以在準實戰環境下維持部隊戰備水平、熟悉作戰海空域環境，並系統性積累跨軍種協同作戰的實踐經驗。具體而言，在聯合戰備警巡期間，解放軍飛行員與艦艇人員能夠反覆熟悉臺海周邊海空域的地理環境、氣象條件、海流特徵等關鍵自然因素，在真實環境壓力下逐步磨合各軍種間的協同機制，提升聯合作戰的整體流暢性與決策效率，並透過在準實戰環境中反覆檢驗武器裝備的實際性能，為未來可能的軍事行動奠定堅實的訓練基礎。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此種訓練的意義遠不止於技術層次的熟練度提升，更在於透過反覆演練

建立跨軍種的默契與信任，形成在高度複雜情況下仍能有效協同的組織文化與指揮習慣。

然而，必須嚴格強調的是，在國際安全研究的分析框架中，「軍事能力」的建構與「即刻動武意圖」應被視為兩個本質上獨立的分析範疇，兩者之間不存在自動推導的因果關係。解放軍致力於提升聯合作戰效能，其核心邏輯首先在於追求與大國地位相稱的軍事能力，其次在於驗證軍改後的指揮體制是否具備實戰效能，以便在必要時為政治領導人提供可靠的軍事選項。「能力」的具備是國家實力的物理基礎，是政治決策時刻得以調用的戰略資源；而「意圖」的發動，則受制於國際格局的整體評估、盟友與對手的預期反應，以及成本效益的理性計算。因此，聯合戰備警巡的常態化，首先應被理解為解放軍「軍事現代化」能力的實戰化驗證過程，是軍改成果向實際戰鬥力轉化的具體展現，而非線性推導出的即刻武力犯臺訊號。換言之，練兵的目標是建立政治決策的前提條件，拓寬政治領導人在關鍵時刻可供選擇的行動空間，而非政治決策本身的既定結果。高強度的常態化練兵，並不意味著中共已將武力攻臺列為近期可執行的政策選項，其核心意涵在於軍事現代化進程中持續的能力建構，透過持續練兵擴充整體作戰選項，使武力解決問題在政治上成為一個時刻存在的可用選項，而非一個迫在眉睫的既定計畫。

然而，「聯合戰備警巡」的戰略意涵，絕不僅限於軍事訓練的技術層次。更為關鍵的是，它在客觀上創造出一種既非單純訓練、亦非直接作戰的模糊中間狀態，具有明確的灰色地帶行動特徵與戰略設計邏輯。中共刻意以「戰備警巡」的名義對外呈現，將其定性為「例行訓練」或「戰備巡航」，在話語層面系統性降低國際社

會的關注強度與反彈力度，而在行動實質上仍具有強烈的政治與戰略意圖。具體而言，透過常態化軍事活動形成對臺的持續性施壓態勢，逐步建立「臺海非國際水域」的既成事實認知，並為未來更高強度的軍事行動預先創造有利的心理空間與政治條件；刻意維持行動性質的模糊性，使聯合戰備警巡在國際法律框架下難以被明確定性為具有攻擊意圖的行動，從而有效規避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充分體現灰色地帶戰略透過累積性施壓逐步改變安全現狀的核心邏輯。

在此分析框架下，「聯合戰備警巡」所呈現的灰色地帶行動邏輯，具有三重相互強化的戰略功能：其一為「切香腸」策略的軍事實踐，透過每一次看似有限的越線行動，持續重塑臺海周邊的軍事現狀，使海峽中線的象徵意義逐步淡化；其二為「溫水煮蛙」的心理施壓，透過長期維持的軍事壓力，讓臺灣社會逐漸習慣威脅的存在，削弱對威脅的感知敏銳度與抵抗動員的社會基礎；其三為「既成事實」的法理積累，透過反覆的常態化巡航，在國際認知層面逐步建構解放軍對臺海周邊擁有常態管轄存在的印象，為未來的法理主張預先鋪墊事實基礎。三者合觀，構成中共以「聯合戰備警巡」為核心的灰色地帶戰略的完整邏輯。

在軍事語言特徵方面，中共自 2022 年 8 月正式宣布對臺海方向實施常態化「聯合戰備警巡」後，此名稱已成為官方固定使用的作戰概念，顯示其已從臨時性應對措施提升為制度化的軍事工具。

相較於其他軍事行動態樣，聯合戰備警巡已形成一套具有明確辨識標準的行動規範：兵力規模方面，每日出動 10 至 30 架次軍機搭配 5 至 10 艘次軍艦，形成穩定可識別的行動規模區間；兵力編組方面，呈現跨軍種聯合特徵，整合戰鬥機、轟炸機、預警機、反潛機及驅護艦等多型平臺，體現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的實際效能；空間範圍方面，頻繁越過海峽中線並進入臺灣北部、東部空域，形成多方向立體施壓態勢，使臺灣防空力量長期處於分散應對的高強度負荷狀態；時間頻率方面，自 2023 年後幾

乎每週實施，達到高度週期性的常態化水準，使之成為解放軍對臺作戰準備的日常組成部分；指揮層級方面，採戰區級統一指揮，涉及跨軍種的精細協調，驗證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實際運作效能；政治宣示方面，採用官方正式名稱但刻意不宣布為演習，維持行動性質的戰略模糊性。此種介於小規模日常擾臺（少於 10 架次）與大型軍演（多於 30 架次）之間的獨特性行動模式，在不觸發全面衝突的精算前提下持續施加累積性壓力，完整符合灰區行動透過模糊軍事行動性質、逐步改變既有安全現狀之核心戰略邏輯，構成當前中共對臺軍事工具箱中最具彈性、可持續性最高的核心手段。

二、由政治事件主導轉為常態化對臺軍事施壓

本研究分析發現聯合戰備警巡的演變呈現明確的三階段軌跡：2021 年為試探階段，行動集中於 10 月國慶期間且單日最高 56 架次，整體頻率尚未常態化；2022 年為轉型階段，8 月裴洛西訪臺後圍臺軍演成為決定性轉捩點，全年共機越線架次激增至 1,732 架次較前年暴增 82%，聯合戰備警巡從零星試探轉為常態機制；2023 至 2025 年為成熟階段，年度執行次數穩定在 31 至 40 次之間，幾乎每週實施且不再完全依附於重大政治事件。在操作特徵方面，呈現三項關鍵趨勢：

（一）質變優先於量變

聯合戰備警巡期間投入之軍機總架次，在 2024 年與 2025 年雖然大致持平，分別為 1,337 架次與 1,328 架次，數量層面的增長趨於平緩；然而，更具戰略意義的「逾越海峽中線」比例卻持續大幅攀升，從 2023 年全年越線比例 36.1%，提高至 2024 年的 60.1%，2025 年更進一步達到 69%。此數據揭示出中共對臺軍事施壓策略的重要質性調整：解放軍並未以單純增加行動數量作為強化威懾效果的主要手段，而是透過持續提高挑釁程度與行動深度，在相似的行動規模下實現更強的心理震懾效果與更大

規模的既成事實積累。

這種「以質換量」的策略取向，具有深刻的戰略計算邏輯。在政治層面，越線比例的提升直接侵蝕海峽中線的象徵地位，使這條曾經維繫臺海基本穩定的非正式分界線，逐步在實際操作層面失去區隔意義；在軍事層面，高比例越線意味著臺灣防空雷達、攔截戰機與指揮系統長期處於高強度應對狀態，加速裝備損耗與人員疲勞的累積；在戰略層面，越線比例的持續攀升製造了一種難以逆轉的行動常態，使國際恐對於中共於臺海軍事態勢的認知標準逐步轉向，形成有利於中共的現狀重塑效果。

（二）恢復週期不規則化

大型軍演後恢復常態化聯合戰備警巡的時間間隔，呈現出顯著的波動特徵，而非可預期的線性規律，構成聯合戰備警巡的另一重要操作特徵。2024 年的三次演習中，「聯合利劍－2024A」演習後耗時 6 日恢復常態巡航，「聯合利劍－2024B」演習後耗時 13 日，無名軍演後則延至 18 日方才恢復，顯示出逐步延長的趨勢，可能反映解放軍在大型演習後進行較為深入的戰備評估與系統性調整。

然而，進入 2025 年後，「海峽雷霆－2025A」演習後的恢復時間縮短至 10 日，「正義使命－2025」後更縮短至 8 日，整體呈現出不規則的波動模式而非單一的線性趨勢。此種間隔時間的動態變化，可能具有多重解讀空間：一方面，可能反映解放軍在不同演習後進行差異化深度評估的實際需求；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刻意製造不確定性的戰略設計。透過模糊化恢復週期的規律性，增加我國情報研判與作戰計畫制定的難度，壓縮我軍事應對的預判空間，同時製造持續性的心理壓力，使我國軍事指揮體系始終處於高度戒備與不確定的負荷狀態。

（三）政治連動即時化

相較於需經較長規劃期與政治鋪陳的大型聯合軍演，「聯合戰備警巡」在行動啟動與執行節奏上，展現出更高程度的即時反應特性。當

臺美於政治層面出現互動，或我國領導人發表涉及主權與兩岸定位之談話後，中共往往於短時間內即透過「聯合戰備警巡」或其他中低強度軍事行動作為回應。

2025 年 3 月 13 日賴清德總統將中共列為「境外敵對勢力」後，3 月 17 日共軍當日即分別於上午與下午各實施一次聯合戰備警巡，成為共軍首度在單一日內兩度執行；4 月 1 日進一步宣布「海峽雷霆－2025A」演訓。按此行動序列分析，「聯合戰備警巡」在政治訊號即時回應功能上，具備遠較大型軍演更高的機動性與靈活性，得以在政治事件發生後的極短時間內，以軍事語言作出明確且可見的回應，無需啟動大型演習所需的複雜後勤準備與政治鋪陳流程。

透過可快速啟動、反覆操作的軍事手段，將特定政治表態與軍事回應加以綁定，使政治言論與安全風險在臺灣社會中形成高度連動關係，進而提高政治決策與言論所需承擔的安全成本。

三、系統性改變臺海軍事平衡並重塑區域權力結構

本文評估聯合戰備警巡對臺灣及區域戰略環境所產生的影響，可從三個相互關聯的層次加以系統性分析。三個層次並非相互獨立，而是在邏輯上形成由近及遠，共同呈現聯合戰備警巡如何以臺海安全為起點，逐步延伸至區域秩序重塑，最終在中美戰略競爭的宏觀框架下發揮結構性作用的完整邏輯全貌。

（一）臺海安全層次

在軍事維度，聯合戰備警巡對臺灣的軍事能力構成具體且不可忽視的持續損耗性壓力。透過年均 40 次的常態化演練，解放軍得以系統性蒐集臺海周邊地形、水文、氣象、電磁環境等關鍵戰場情報，持續完善作戰環境數據庫，使未來可能的作戰行動得以在高度熟悉的環境中展開，大幅降低「戰場不確定性」這一影響作戰效率的關鍵風險因素。

更為關鍵的是，常態化聯合戰備警巡所建

立的「由訓轉戰」能力，有效壓縮了臺灣的戰略預警時間。在常態化軍事存在形成之前，兩岸軍事衝突的爆發往往需要一段可供觀察與評估的政治緊張升溫期，我國得以在衝突爆發前完成一定程度的動員準備；然而，隨著解放軍在臺海周邊建立持續的軍事存在，「由訓轉戰」的臨界點大幅降低，臺灣可用於危機應對的預警窗口從過去的數週，逐步壓縮至數日甚至數小時，使快速動員與有效應對的難度呈指數級上升。在直接消耗層面，2024 年臺灣為應對解放軍頻繁的軍事活動所投入的攔截成本，估計達 30 至 45 億元新臺幣，並造成飛行員疲勞累積、裝備加速磨損等難以量化但不可忽視的隱性損耗，形成中共以相對可控成本迫使我國付出不對稱代價的消耗戰。

政治上，聯合戰備警巡對臺灣社會的心理衝擊同樣具有深遠影響，且可能在長期累積下形成更難以逆轉的結構性效果。透過高頻次軍事活動在臺灣社會持續製造「戰爭隨時可能爆發」的威脅氛圍，逐步侵蝕社會層面的抵抗意志與心理韌性，使部分民眾在面對長期持續的安全壓力時，傾向以妥協或迴避衝突來換取短期的安全感，而非維持積極防衛的心理態勢。透過政治與軍事的即時連動機制，對特定政治主張的公開表達形成具體的安全成本，實質約束相關政治論述的社會空間。

(二) 區域秩序層次

軍事上，解放軍透過聯合戰備警巡頻繁突破第一島鏈的實際行動，持續改變東亞整體的軍事地理格局，使第一島鏈從冷戰時期構成對中共戰略封鎖的防線，逐步轉變為解放軍常態化出入的彈性邊界。2024 年，日本航空自衛隊因應中共軍機威脅而緊急升空達 464 次，佔全年緊急升空總次數的 66%，清晰顯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力量優勢，正面臨來自解放軍的系統性結構性挑戰。此趨勢若持續發展且不受有效制衡，將從根本上重塑東亞的戰略地理想像，影響地區國家對地緣政治現實的認知與政策判斷。

政治上，中共透過在東海、南海同步建立常態化軍事存在，對美軍艦艇與飛機實施跟蹤監視與近距離對峙，實質挑戰美國長期主導的「航行自由」原則與印太安全架構的可信度及有效性。與此同時，以「亞洲新安全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話語操作，爭奪區域安全秩序的規則制定主導權，試圖在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框架之外，構建以中共為核心、以「不干涉內政」原則為基礎的替代性區域秩序，吸引在中美競爭格局下尋求戰略自主的地區國家向中共主導的秩序框架靠攏。

(三) 中美戰略競爭層次

軍事上，聯合戰備警巡作為驗證突破第一島鏈能力的常態化實戰平臺，在中美戰略競爭格局下具有多重戰略功能，且相互強化。透過反覆進行的遠程兵力投射測試，解放軍持續積累跨越第一島鏈進行遠洋作戰的實際經驗，驗證後勤補給、指揮通訊與跨域協同在真實環境壓力下的實際效能；透過 A2/AD 戰略的反覆演練，持續提升在美軍可能介入情境下的反介入的效能。與此同時，高頻次的常態化行動本身即構成一種不對稱消耗戰略，迫使美軍前沿部署的力量長期維持高強度警戒狀態，持續消耗美軍的精力、情報資源與設備損耗的戰略代價。

政治上，透過展示日益強大且持續快速增強的軍事力量，中共系統性削弱美國「戰略模糊」政策所依賴的威懾可信度，使外界對美國在兩岸衝突時刻是否真正願意介入、以及是否具備有效介入的能力，產生持續的不確定性疑慮。從更宏觀的戰略視角審視，中共透過持續的軍事行動，逐步將臺灣問題從傳統的雙邊危機管理議題，提升為界定中美關係根本性質、決定 21 世紀國際秩序走向的核心戰略博弈場域，使「臺灣問題」成為中美戰略競爭中最具槓桿效果的關鍵變數，而「聯合戰備警巡」則是此戰略意圖最具體、最常態化的軍事實踐工具，作為中共以軍事實力等待最佳統一時間視窗的關鍵戰略支撐，實踐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長遠戰略目標。

從「武力解放」到「威懾統一」 中共對臺軍事政策的演變

彭冠達 /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所碩士

一、難以迴避的歷史命題

若試圖從一個相對客觀的位置觀察七十餘年的臺海局勢，恐怕會得到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中共從未真正放棄武力統一的選項，只是在每一個時代選擇了不同的包裝方式。這並非情緒化的政治判斷，而是由這篇以決策理論與歷史制度主義為架構、系統理論框架中來整理這五位領導人對臺軍事政策的研究，所顯示的核心邏輯。本文嘗試以一個不帶強烈立場的第三者角度，重新詮釋這份研究的主要發現，並提出若干延伸性的觀察。

二、政策的連續性目標及不變的手段

任何試圖理解中共對臺政策的人，都必須先接受一個基本事實，儘管歷代領導人在風格與方法上差異懸殊，「統一臺灣」這一目標卻從未動搖。毛澤東時代的「武力解放」充滿意識形態的革命理性，1954 年與 1958 年的兩次臺海危機，表面上是軍事行動，但骨子裡更多是政治試探。事後回顧，這些行動幾乎沒有改變臺海分治的現實，卻奠定了一個模式，軍事威懾作為政治語言的延伸。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堪稱整個政策演變中最具創意的轉折，將軍事手段從「首選」降格為「最後手段」，並非出於善意，而是理性的戰略重新計算，改革開放的利益遠比武力統一的收益更為豐碩，且風險更低，然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這一保留，始終如同一把懸而未落的劍。江澤民時代最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的「制度化」轉向，2000 年白皮書

首次明文列舉動用武力的三種情形，是對臺政策從模糊威懾走向法理威懾的動武合法性。1995 至 1996 年的臺海危機固然展示了中共的軍事決心，卻也暴露了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嚴重不足，進而刺激後續加速的軍備建設。

胡錦濤時代的「和平發展」看似柔性，實則是一場精密的兩面策略，透過 2005 年《反分裂國家法》構建武力使用的法律框架，同時以 ECFA 等經貿協議深化兩岸相互依存，這一時期後來暴露的問題，是對臺灣政治生態的變化預判嚴重不足，給中共得到了一個經驗，經濟的惠臺並不會帶來政治認同。習近平接班後，帶著整個政策序列的改革並加速。習近平在 2019 年的《告臺灣同胞書》中提到「統一問題不能一代代拖下去」這句話，不僅是個人表態，更是在向所有相關者宣告，時間窗口正在收窄，軍機繞臺、越過海峽中線、環臺封鎖演練，將軍事威懾常態化，使其成為新的基準線。

三、決策機制的三種邏輯說明理性、慣性與利益

決策者個人「理性模式與有限理性模式」方面，五位領導人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輪廓，毛澤東的「革命理性」在戰術層面精密計算，在戰略層面卻受制於意識形態的框架，鄧小平的高度務實，使其能夠客觀評估國際現實，是五人中理性程度最接近傳統意義上「戰略家」形象，習近平則是個人理性的回歸，伴隨著決策高度集中化的雙重效應及清晰的戰略意志，以及對誤判風險缺乏制衡的危險。

「漸進模式」的分析顯示一個常被忽略的

維度，任何政策框架一旦建立，都會產生路徑依賴，鄧小平建立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框架約束了江澤民與胡錦濤的選擇空間，使他們在即便已看到框架局限的情況下，仍難以進行根本性調整。習近平的「去制度化」動作，重組涉臺決策機構、將決策權高度集中的調整，可以理解，如試圖打破這種路徑依賴，卻同時也引入了新的不確定性，但依然是走在鄧小平的路線上調整，「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框架。

由「官僚組織議價」的視角或許是三者中最被低估的一個，軍方偏好強調威脅以爭取資源，國臺辦傾向維護穩定關係以彰顯職能，外交部顧慮國際形象，統戰部重視柔性手段，這些相互拉扯的力量，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比例影響著最終政策，胡錦濤時代的「集體決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各部門議價的均衡結果，習近平時代的強力集中，壓縮了這議價的空間，效率或許提升，但多元意見的改正機制也隨之弱化。

四、挫敗的政策

在研究的過程中，用客觀的角度看出了中共的挫敗，中共對臺軍事威懾在某種意義上是自我挫敗。持續的軍事壓力確實對臺灣獨立傾向產生了一定嚇阻作用，但同樣的壓力也在臺灣社會中強化了防衛意識，侵蝕了「和平統一」的民意土壤，並為美國強化臺海介入提供了正當性的力量。換言之，中共愈是強化軍事威懾，其所追求的「和平統一」路徑就愈加難以實現，而武力統一的代價也因國際化效應而不斷攀升。這並非新發現，但無論對臺灣的政策制定者，還是對嘗試理解這場長期博弈的任何觀察者而言，仍具有重要的認知價值。

五、決策記錄的完全封閉

中共的核心決策記錄近乎完全封閉，這意味著所有關於「部門議價」或「領導人認知框架」的分析，都不得不依賴公開文件、官方媒體、以及若干參與者的回憶錄，這些資料均已

經過不同程度的篩選與修飾，當然也只能用現有資料來做分析，由白皮書內容、領導人重要的講話，或是新聞媒體。

六、對當前局勢的觀察「不確定性」是最確定的事

從第三者角度審視當前局勢，有幾點觀察值得提出。第一，核武擴張是被低估的變數，預計 2030 年達到 1,000 枚核彈頭的規模，不僅是對美嚇阻能力的躍升，也將為中共的常規軍事行動提供更大的戰略掩護空間。其次，俄烏戰爭是一個雙向的教訓，一方面，它展示了頑強抵抗對入侵者的消耗；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封鎖戰術、資訊戰與混合威脅的實戰案例，中共觀察這場戰爭，必然在兩個方向上同時學習。第三，「灰色地帶」威脅的持續性可能超過直接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網路戰、認知作戰、經濟施壓、外交孤立，這些手段的組合，構成一種不需要宣戰就能持續消耗的長期壓力，臺灣面臨的最大挑戰，或許不是某一場具體的軍事危機，而是如何在長期的多維度壓力下維持社會凝聚力與戰略意志。

七、理解不等於接受，但理解是必要的

研究臺海問題的學者，長期面臨一個兩難，過於強調威脅，可能強化恐懼與對立；過於強調緩和，可能低估風險並產生誤判。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這份研究最重要的貢獻，或許正是它所呈現的這一根本提醒，中共對臺政策不是一個可以用單一邏輯（純粹理性、純粹意識形態、或純粹部門機構利益）解釋的現象，而是多重力量在特定歷史制度環境下持續互動的產物。理解這一複雜的政策產出，是任何有效因應中共對臺軍事政策的起點，不理解對手的邏輯，就無從判斷哪條紅線真正危險，哪些空間仍然存在。臺海的和平從來不是自然狀態，而是各方克制與計算共同維持的均衡，維護這個均衡，需要的不只是武力準備，更是對於戰略理解與持續的政策智慧。

歷史與國關

吳玉山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在「歷史與國關」的研究當中，最常出現的理論議題是重大的歷史事件可以完全由物質和權力的因素所決定，還是必須納入理念等非物質因素的考量，而如果兩者均扮演一定角色的話，則它們是怎樣的結合？這個問題所反映的，其實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理性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的論辯與對話。此種理論典範之間的互動既然普遍存在於針對當代議題的國關研究當中，自可推想也會出現於歷史與國關的研究之中。對於後者而言，重點是如何依循理論，提出包含物質與非物質因素的框架來詮釋歷史，又如何透過此種詮釋的過程和結果來改進理論，以為今世之用，也就是跨越理論與案例、歷史與當代。本專刊的三篇論文與研究紀要，均依循著這個取向，而各有所闡發。

薛健吾在〈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蜀、吳兩國「統治集團」與「軍制」的差異如何影響其抗衡魏國的行為〉當中，認為在三國時代蜀漢與孫吳力均不及曹魏，但是兩國對於曹魏的抗衡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國力最小的蜀漢經常興舉國之力不斷伐魏，以「討伐曹賊、復興漢室」，即使戰績不佳也不放棄，此種行為模式可謂「過度制衡」。與此相對的是江東孫吳雖然實力超過蜀漢，但對於曹魏卻是進行現實主義所期待的「適度制衡」，其目的只是要逐退曹魏的進逼，並試圖取得長江中、下游的戰略要地，並不要滅曹與漢。蜀、吳對北方強權的不同戰略，顯然無法以一般的現實主義因素來解釋，這就開啓了非物質因素的解釋之門。作者採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途徑，認為蜀、吳

各自的統治集團特色和不同的軍制是重要的解釋變項。蜀漢從立國以來，便有荊州的「外來政權」與益州的「本土政權」之間的競爭，對於劉備和諸葛亮等外來的統治者而言，由於他們掌權的正當性在於匡復漢室的正統，因此進行以復興漢室為名的北伐就變成維護政權正當性的必要行為，因此他們是主戰派，在 15 年間進行了至少 16 次的北伐（諸葛亮 5 次、姜維 11 次）。反之，對於出身於蜀漢的統治集團和將領而言，由於本身就具有在地統治的正當性，因此不需要倚靠北伐來合理化他們的地位，遂成為務實派。最後，當本土派被外來統治集團長期壓抑後，甚至出現了不如投降魏國的投降派。蜀漢的連續伐魏，就是外來統治者持續掌權的結果。相對而言，孫吳比較沒有外來與本土菁英之間的矛盾，孫家的外來勢力與江東豪族相互融合、共同立國，而復興漢室也從來不是孫吳在安全議題上的目標，所以鮮有以舉國之力進行北伐。另外就軍制而言，蜀漢的軍制相對集權，有利於其集中力量進行北伐，而孫吳的軍事力量則相對分散，雖有利於局部的防守，但卻不利於其集中力量進行北伐。因此不同統治集團對於合法性的需求，和不同軍制的動員能力就解釋了蜀漢與孫吳對曹魏的不同政策。在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非物質因素的合法性需求與軍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陳思宇和張登及所撰的〈天下的越南與越南的天下：越南後黎朝對外交往之關係與權力研究〉當中，關注的焦點轉移到中國和越南之間的歷史關係，以及越南在其所構做的南方天下中，和其周邊小國之間的關係。論文標題

中所謂「天下的越南」指的便是中越關係，而「越南的天下」則是指越南和其周邊的關係。自來學界研究天下秩序和朝貢體系，即有「權力」與「關係」兩大途徑，這就構成本文探究越南享國最久的後黎朝與明、清之間的關係，以及後黎和占城、哀牢、真臘等周邊國家之間關係的初始框架。本文把「權力」和「關係」的因素具體操作成「權力平衡」和「關係平衡」兩種行為模式。他們認為關係是基於「共性」，而共性又有「前置共性」（國家在交往前已經存在的共性）和「即興共性」（在交往過程中所創造和確認的共性）兩種。他們假設兩國在交往開始時，會先確認是否有前置共性，如果有便進入以關係為主要考量的相處模式，在逐利時會展現克制的行為。而當兩國無法確認共性、或面臨共性危機時，越南會對中國採取關係平衡，而對周遭小國採取權力平衡。文中透過追溯史實，發現後黎與明、清都經歷了一段確認共性的交往階段，其中由於前置共性的強弱不同，後黎接受明朝的冊封只花了 10 年，而接受清朝的冊封則花了 20 年。朝貢關係確認後，明、清在與後黎的互動過程中自然也不免有利益衝突，但大都在雙方彼此克制的情況下維持穩定與和平。不過後黎在面對中國和面對周邊時，是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中國後黎的越南是藩屬，必須「事大」，然而在面對周邊小國時，後黎卻展現了「天子」或「皇帝」的姿態，自認是南方的核心，與中國「各帝其國、各華其華」。由於周邊國家的族群和信仰的特性與越南有所殊異，因此後黎與周邊不易建立共性，所以在互動時經常會訴諸於權力平衡的模式。因此史實確認了研究假設，即在後黎越南的對外關係模式當中，關係平衡是首選，僅有在共性和關係無法確認維持時，才會走入權力平衡的模式。

在〈必由之路？區域霸權與海外拓殖：明清兩代的史料檢視〉的研究紀要當中，楊仕樂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當強權崛起時，

是否必然會與既有的霸權產生衝突，此種「權力轉移」與「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題真的具有普適性嗎？在歷史中，美國曾經在一戰後出現孤立主義，而中國的明清兩代也在鄭和充分地展現了中國的遠洋能力後，選擇不進行海外拓殖，此與歐洲的發展模式大相逕庭。因此新興強權必然擴張到極限（特別是進行海外拓殖）的想像未必獲得歷史的證實，而值得進一步地推敲。本文一開始便舉出歐洲的海外拓殖、美國的孤立主義，和明清的陸地保守等不一致的現象，揭示了強權擴展模式的差異。在詳細地檢閱了相關文獻之後，作者認為如果僅考慮物質條件將無法充分地解釋歐洲、北美和明清的差別，還必須納入理念的因素。作者於是針對明清在成為東亞的陸上霸權後，並沒有持續進行海上拓殖的現象加以深入探究。其法是對於《明實錄》和《清實錄》進行文字探勘，來比較物質和理念因素在解釋明清的陸地保守主義上究竟孰輕孰重。前者集中於地大物博無須拓殖、另有外敵威脅、遠航不符成本效益等考慮，後者則聚焦於重義輕利、天人感應、倫理道德等因素。作者計算了各類因素的時間分布，發現對於明朝而言，阻止持續遠航的主要因素是保守文化，佔有三分之二的比重，但是物質因素（特別是成本效益不彰）也產生了一定的效用，佔比是三分之一。至於阻止清朝遠航的原因主要也是保守文化（佔 65%），其餘才是物質性因素。不論是明清哪一朝，都是在極盛時出現了理念型的陸地保守主義，使得明朝在鄭和後就沒有遠航、而清朝則是一開始便約束住海洋擴張。到了這兩個朝代國力較衰後，物質性的限制便會大幅增長，使得兩朝君主無法考慮向海外進行拓殖。作者最後總結，認為強權在陸地上形成後，雖然國力上可以進行遠航與海外拓殖，但是並沒有必然的物質驅力去競逐海上的霸權，此時理念型的因素便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從明清的史料中可以得出系統性的證明。

本專刊的三篇歷史與國關論文和研究紀要以物質和非物質的雙重解釋框架，來理解蜀漢與孫吳對曹魏過度制衡與適度制衡的差異，後黎越南在面對明清與周邊時先求關係平衡、再求權力平衡的行為模式，以及明清霸主的海外拓殖保守主義。這三篇論文都清楚地指出單純依賴物質與權力變項無法充分解釋國家的對外行為，理念、制度與關係等非物質變項具有重大的影響力，以及充分的解釋需要揉合物質與非物質、現實主義與其他典範的分析框架。這使得我們更進一步理解了歷史，也檢視了國關理論。

三篇論文和研究紀要在結尾時更將論文的識見一般化，並嘗試運用於當今世局。薛健吾在指出統治集團的合法性理念對於蜀漢和孫吳所造成的影響後，把此一觀點用到兩岸，而認為單純的物質權力無法解釋兩岸相互的政策，此與三國時期恰是一致的。對於臺灣而言，在蔣介石時期，由於其正當性的來源就是維繫中華民國與反共，因此即便在客觀實力與國際環境上皆不允許，他還是以反攻大陸為目標。到了蔣經國的時期，由於合法性的來源已經逐漸轉移，因此逐漸弱化了對於反攻大陸的堅持。而在民主化之後，從李登輝以降的歷任總統，對於中國大陸大都走向兩岸互不隸屬的方向。這些變化反映了臺灣執政者的合法性基礎轉變，而非兩岸權力對比的改變。如果單從後者來看，臺灣相對於對岸處於最有利地位的時期是李登輝在任的 1990 年代初，但那時臺灣的大陸政策卻正從與中共爭正統大幅後退下來，轉為專注臺灣本身。陳思宇和張登及在指出越南先關係、後權力的對外行為取向之後，表示對國際關係的中小行為體而言，關係平衡的共性途徑賦予了他們較多的自主性。蓋中小國家不必只經由內外部平衡、以高成本來試圖改變權力對比，還可選擇在既有脈絡下尋找並確認與其他行為體的共性，來穩定與大國的互動，甚至要求較強大一方做出妥協。當然，「關係平衡」

一旦失敗，中小國家一旦被認為嚴重違背既有的共性，便有可能遭受更嚴重的報復，導致巨大危機。最後楊仕樂在指出霸權不一定會走向海外拓殖後，批評西方的「霸權穩定」與「權力轉移」理論完全以物質和現實主義的角度來預測美中必將衝突，其實是把自己出於文化理念所主張的強者必霸觀點，說成是物質上的必然且四海皆準。美中衝突不是強權政治的悲劇宿命，而是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理念的作用，因此就還有改變的可能。這三篇論文與研究紀要論及兩岸政策背後的理念基礎，小國的運用關係之道，和崛起中國的行為，與當前世局緊密結合。

歷史與國關透過理論研究歷史，並以古鑑今，除了深化對於重要史實的瞭解，也把歷史的經驗帶到了今天，具有重大的學術與現實意義，故而刊出與學術界和讀者大眾共享。

2026 年 TASPAA 年會中的中國大陸研究

陳聿伶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行政專員

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第 21 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26 年 5 月 22 日至 23 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主題為「邁向永續發展的公共治理：AI 時代的機會與挑戰」，本屆由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統籌年會各項籌備事宜。本屆研討會計有 2 場國際論壇、25 場自組與策展場次，匯集來自三大洲的 15 位國際學者、200 位論文發表人及百餘位評論人，產官學界與會者達 900 餘人。會議由 TASPAA、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公共事務研究所及臺北市政府共同主辦，國科會與財團法人民主基金會贊助，考試院、考選部、審計部、交通部、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臺北市政府資訊局、中國人事行政學會及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協辦。

本屆年會共收錄 13 篇與中國大陸相關之論文，分布於一般論文場次 3 篇、Lightning Talks 場次 2 篇、自組場次 4 篇及海報場次 4 篇。就論文題目觀之，相關研究面向可大致歸納為五類：其一為中國大陸內部治理，包括中共鄉村振興戰略，以及經濟發展與不平等對社會抗議之影響；其二為科技治理與中美科技競逐，涵蓋中國 AI 治理法規之承與變，及中美半導體動態博弈下臺灣之戰略應對；其三為對外戰略與國際關係，包括中國潔淨能源外交、習近平外交決策思維之語言分析、安倍晉三對華戰略與 Quad 倡議，以及中美競爭下臺日民意好感度變化與美國印太戰略對臺軍事戰略之影響；其四為兩岸關係與臺灣安全，涉及威權滲透與政權認同變遷、共機擾臺與媒體框架等議題；其五為中國古典思想與歷史治理，包括重探戰國時期議題管理策略，以及援引《易經》與中醫典籍探討國家治理與永續經營。

各篇論文之場次、時間、主持人、發表人與評論人資訊，詳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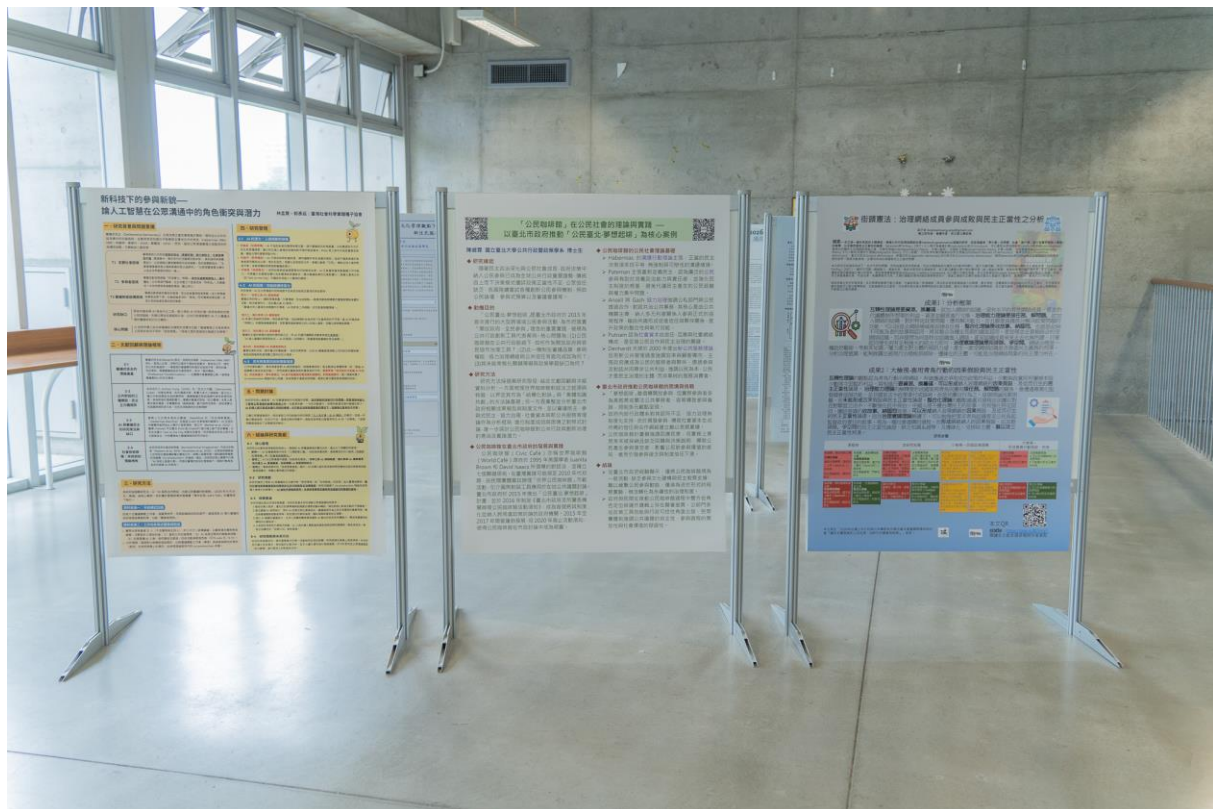
2026 年 TASPAA 年會閉幕式大合照

場次	時間 / 地點	主持人	論文題目	發表人	評論人
【A6】 公共政策與民主參與	5/22 (五) 15:10~16:30 307 教室	彭錦鵬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副教授)	威權滲透與政權認同變遷：臺灣經驗的啟示	王嘉州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黃凱莘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A13】 考選制度與公務人力資本 (考選部場次)	5/23 (六) 09:00~10:20 301 教室	林明裕 (考選部政務次長)	重探戰國時期的議題管理策略：馮諼市義的成功 vs. 朱英預警的失敗	朱鎮明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劉鴻陞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A16】 民主治理與政策擴散	5/23 (六) 14:20~5:40 302 教室	陳秋政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中國 AI 治理法規的承與變－數位主權與數位擴張間之博弈競奪	林昕璇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左宜恩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郭銘傑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B4】 治理成效與國際局勢 (Lightning Talks)	5/23 (六) 10:30~11:50 307 教室	朱金池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兼任教授)	中共鄉村振興戰略之治理機制與成效分析	黃予濤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朱金池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兼任教授) 廖小娟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B6】 能源轉型與永續淨零 (Lightning Talks)	5/23 (六) 14:20~15:40 307 教室	李翠萍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國潔淨能源外交下的東南亞國家能源轉型路徑	李明勳 (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輔佐研究員)	李翠萍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黃婉玲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D21】 國際事務與區域戰略 (自組場次)	5/23 (六) 14:20~15:40 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羅至美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暨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	共機擾臺、媒體框架與臺灣民衆的鷹鴿氛圍	陳丕舒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3 屆)	李冠成 (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
【D21】 國際事務與區域戰略 (自組場次)	5/23 (六) 14:20~15:40 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羅至美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暨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	美國印太戰略對臺軍事戰略之影響 (2017-2025) – 以「不對稱作戰」為例	顧上鈞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第 23 屆)	揭仲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
【D21】 國際事務與區域戰略 (自組場次)	5/23 (六) 14:20~15:40 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羅至美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暨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	臺日民衆在中美競爭下的好感度變化：2014 至 2023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分析	李枝名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3 屆)	俞振華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暨政治學教授)
【D21】 國際事務與區域戰略 (自組場次)	5/23 (六) 14:20~15:40 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羅至美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暨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	安倍晉三對華戰略之改變：Quad 倡議之起源與發展	陳怡仲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1 屆)	唐欣偉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海報場次 (社會治理補充)	5/22 (五) 12:30~13:30 社科院東側 3 樓 學生開放空間	—	經濟發展與不平等對中國社會抗議的影響	史凱文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
海報場次 (性別平等與社會權益)	5/23 (六) 11:50~12:50 社科院東側 3 樓 學生開放空間	—	以《易經》中的〈臨卦〉、〈觀卦〉和《黃帝內經》與《傷寒雜病論》中的中醫醫學理論共同來探討國家治理與永續經營	林永翔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海報場次 (AI 應用與全球戰略)	5/23 (六) 11:50~12:50 社科院東側 3 樓 學生開放空間	—	武器化的相互依賴理論與韌性：2022-2026 年中美半導體動態博弈與臺灣之戰略應對	江瑜庭 (國立清華大學科管院學士班三年級)	—
海報場次 (AI 應用與全球戰略)	5/23 (六) 11:50~12:50 社科院東側 3 樓 學生開放空間	—	A World in his Eyes? How Xi's Metaphors and Analogies Imply his Heuristics to Foreign Policy	王冠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

註：海報場次依議程未設主持人與評論人，以「—」表示；B4、B6 為 Lightning Talks 場次，評論人為全場共同評論，非逐篇指定。



2026 年 TASPAA 年會議程總表



2026 年 TASPAA 年會 – 海報場次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 158 期

Mainland China Studies Newsletter No.158

<https://politics.ntu.edu.tw/?p=24994>

發行者：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贊助者：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榮譽主編：石之瑜（臺大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主編：劉康慧（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執行編輯：陳世民（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編委會：郭紀賢（臺大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陳世民（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黃旻華（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劉康慧（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蘇翊豪（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編輯助理：陳聿伶

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886-2-3366-8450

傳真：886-2-2365-3433

印刷者：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電話：886-2-2382-1120